



杜威教育丛书 单中惠◎主编

*Renewal of Life by Transmission.
The most notable distinction between
living and inanimate
things is that the former
maintain themselves
by renewal. A stone
when struck resists. If
its resistance is greater than the force of
the blow struck, it remains outwardly
unchanged.*



单中惠 王凤玉◎编

杜威 在华教育讲演



教育科学出版社

杜威教育丛书

丛书主编：单中惠

杜威 在华教育讲演

DUWEI

ZAIHUA JIAOYU JIANGYAN

单中惠 王凤玉 编

教育科学出版社

· 北 京 ·

责任编辑 樊慧英
责任校对 刘永玲
责任印制 曲凤玲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杜威在华教育讲演/单中惠, 王凤玉编.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7. 1

(杜威教育丛书/单中惠主编)

ISBN 978 - 7 - 5041 - 3659 - 6

I. 杜... II. ①单... ②王... III. 教育学 - 文集
IV. G4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94032 号

出版发行	教育科学出版社	市场部电话	010 - 64989009
社 址	北京·朝阳区安慧北里安园甲 9 号	编辑部电话	010 - 64989449
邮 编	100101	网 址	http://www.esph.com.cn
传 真	010 - 64891796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莱芜市圣龙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5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字 数	403 千	印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80 元	印 数	1 - 7 000 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敬告作者

在编辑出版《杜威在华教育讲演》过程中，我们通过各种渠道与作者联系。由于部分作者或著作权人姓名、地址不详，暂时无法取得联系，敬请作者或著作权人予以谅解，并尽快与我们联系，以便寄奉样书和支付稿酬。

联系人：曹德志

电话：010-62999328 传真：010-62906119

联系单位：教育科学出版社

序

美国教育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在美国历史上的大转折年代，认真思索了社会对学校的挑战和需求，既批判了传统教育的理论和方法，又主持了芝加哥大学初等学校的教育实验。在他自己漫长的教育生涯中，杜威始终没有停止对“现代教育”的探索，撰写了大量教育著作和论文。这不仅对西方教育理论和实践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且奠定了他作为西方教育大师的地位。1991年，美国南伊利诺斯大学卡邦代尔分校杜威研究中心整理出版了《杜威著作全集》（37卷）。

人们普遍承认，杜威是20世纪美国乃至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一位教育家。因为他确实给教育带来了一场深刻的革命，在教育领域中引起了重要的变化。尽管杜威经常被人误解，在50年代还受到一些人的攻击；但是，人们在60年代以后重新表现出对他的教育思想的热情，更深入和更理性地反思杜威对“现代教育”的探索。正如美国学者洛克菲勒（S. C. Rockefeller）所指出的：“在20世纪前几十年里，杜威正处于他的生涯的顶峰……然而到50年代，对他的著作的早期的广泛的兴趣却在衰退。但是，一种对杜威的更广泛的学术理解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在80年代里，人们重新意识到经典的美国哲学传统的价值，包括对杜威的学术成就的肯定。”^①

^① S. C. Rockefeller, John Dewey Religions Faith and Democratic Human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91, Preface.

杜威的教育思想在近代中国也曾得到广泛的传播,使他成为当时对近代中国教育影响最大的西方教育家。在1949年后的近30年里,杜威研究几乎沉寂。但是,从1979年起,无论在哲学思想上还是在教育思想上,中国学者开始以实事求是的态度重读杜威,不仅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且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无论对西方教育界还是对中国教育界来说,杜威教育思想研究都是一个基本课题。美国教育学者罗恩(R. J. Roth)曾这样指出:“未来的思想必定会超过杜威……可是很难想像,他在前进中怎么能够不通过杜威。”^①我国教育史学者赵祥麟先生也曾指出:“只要旧学校里空洞的形式主义存在下去,杜威的教育理论将依旧保持生命力,并继续起作用。”^②因此,杜威教育丛书的出版正是基于我国教育界重读杜威的需要。

杜威教育丛书包括了《杜威教育名篇》《杜威学校》《杜威在华教育讲演》。

《杜威教育名篇》一书由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赵祥麟和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王承绪编译。该书包括了杜威从1897年到1952年的17本(篇)主要论著,其中既有《民主主义与教育》《学校与社会》《儿童与课程》《明日之学校》《我们怎样思维》《经验与教育》等一些重要著作,又有《我的教育信条》《教育上的兴趣与努力》《芝加哥实验的理论》《心理学中的反射弧概念》等一些重要文章。从《杜威教育名篇》中,读者可以了解杜威的教育思想体系。

《杜威学校》一书由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王承绪、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赵祥麟、上海师范大学教科院顾岳中、浙江大学教育学院赵端瑛翻译。该书是芝加哥大学初等学校凯瑟琳·坎普·梅休

① R. J. Roth, John Dewey and Self-Realization, Prentice-Hall, Inc., New York, 1962, Preface.

② 赵祥麟:《重新评价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0年第2期。

(Katherine Camp Mayhew) 和安娜·坎普·爱德华兹 (Anna Camp Edwards) 这两位教师于 1936 年撰著出版的, 详细地叙述了杜威学校作为一所实验学校的起源、办学目的以及方法, 为读者生动而具体地展现了杜威的教育实验。杜威本人曾认为, 梅休和爱德华兹的《杜威学校》对这所实验学校的工作作了全面而有权威性的论述^①。后来他写成的《民主主义与教育》和《我们怎样思维》等著作正是杜威学校教育实验的直接成果。

《杜威在华教育讲演》一书由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单中惠教授和华东师范大学教科院博士生、沈阳师范大学教科院副教授王凤玉汇编。该书按教育哲学、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平民教育、职业教育、大学教育、现代教育、伦理教育、学生自治和教师职责等 10 个方面汇编了杜威从 1919 年 5 月到 1921 年 8 月在中国的 61 篇教育讲演。为方便读者对杜威在华教育讲演的阅读和理解, 在每一部分前还提供了一篇简要的导读。从《杜威在华教育讲演》中, 读者可以了解 20 世纪 20 年代杜威在中国的教育活动及其思想。

杜威教育丛书即将付梓。在此之际, 应该感谢《中国教育报》“读书周刊”张圣华主任, 正是在他的激励和支持下, 杜威教育丛书得以顺利出版。希望杜威教育丛书的出版能为我国教育界重读杜威以及新课程改革的深入提供一些启示和帮助。

杜威教育丛书主编 单中惠

① 简·杜威著, 单中惠编译:《杜威传》,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87 年版, 第 32 页。

杜威教育思想与近代中国教育

(代前言)

单中惠

尽管现代美国教育家杜威 (John Dewey) 作为一位具有世界性声誉的教育家, 曾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教育产生了影响, 但是, 他的最大影响在中国。由于杜威亲自来中国访问和讲学, 再加上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时的学生胡适、陶行知、陈鹤琴等人的宣传, 使得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 20 世纪前半期的中国成为一种传播极广的教育思想, 其影响超过了任何一种西方教育思想。胡适在《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中曾这样写道: “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 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这样大。”^① 原北京大学教授、现代中国教育学者吴俊升在增订《杜威教授年谱》中也强调指出: “中国教育所受到外国学者影响之广泛和深远, 以杜威为第一人。杜威所给予外国教育影响之巨大, 也以中国为第一国。”^② 美国教育学者施瓦茨 (B. Schwartz) 也指出: “在 20 世纪中国的学术史上, 约翰·杜威与现代中国之间的交往是最吸引人的事件之一。”^③ 总之, 在教育界, 西方著名学者中最熟悉中国的人当

① 葛懋春、李兴芝编:《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第 181 页。

② 转引自杜威著, 王承绪译:《民主主义与教育》,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 滕大春序。

③ B. Keenan, The Dewey's Experiment i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A, 1977, Preface.

首推杜威，中国学者最熟悉的以及对近代中国教育影响领域最广、程度最深和时间最长的西方学者也当首推杜威。

一、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杜威访华前的传播

早在民国初年，一些中国学者就提倡“科学”和“民主”。实际上，“从1915年起，塞先生和德先生的口号在那些自由改革家中间已颇为流行”^①。正是在“科学”和“民主”的口号下，西方的各种思想被介绍到中国来。一些西方哲学著作，特别是孔德（A. Comte）、达尔文（C. R. Darwin）、赫胥黎（T. H. Huxley）的著作，为实用主义哲学和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作了准备。

在领导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了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主持制定并颁布了改革教育法令，建立新学制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封建社会的教育进行了改造。这标志着传统的封建教育在形式上的终结，也标志着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开始。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明确指出：“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②在文化和教育上，也是如此。对于当时中国教育界的人士来说，如何解决在教育近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如何根据中国社会的特点有选择地学习和吸收西方有益的教育思想，如何把西方先进的教育体制和思想与中国的教育实践结合起来，是他们努力思考和试图解决的问题。在《美国与中国教育》（America and Chinese Education）一文中，杜威曾这样写道：年轻的中国人“需要西方的知识和方法，以便他们自己独立地运用它们去发展中国，

① The Dewey's Experiment in China, p. 49.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74页。

而不是抄袭其他国家”^①。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去美国留学，想从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因此，批判传统学校教育的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于当时中国教育界那些怀着“教育救国”主观愿望的知识分子是富有吸引力的。正如杜威所指出的：“人们还没有在其他地方如此经常地听到像今天中国青年代表人物的口中那样说的，即教育是改造中国的惟一方法。”^②

近代中国教育家王国维在西方教育理论的传入过程中曾起了很大的作用。1901年5月在上海创刊的《教育世界》由他担任主编，较为系统地评价与传播西方教育理论和教育制度，在当时中国教育界对西方教育理论的研究上起了先锋的作用。这本在中国开教育专业刊物之先河的杂志，在创刊之初以译文为主，介绍日本、欧美各国的教育理论以及教育的历史和现状，几乎包括世界教育发展史上的各种教育理论流派。

此后，于1909年创刊的《教育杂志》也是近代中国教育界又一重要教育专业刊物。这本杂志一直发行到1948年，对西方教育理论和制度，尤其是美国教育制度和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

20世纪以后，特别是民国以后，在中国传播的西方教育理论中，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是一种重要的教育理论。主张学习与传播当时先进的西方科学文化和教育理论的蔡元培1912年2月发表了《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评述了西方的实利主义教育，成为了在中国最早介绍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人。蔡元培指出：“实利主义教育以人民生计为普通教育之中坚。其主张最力者，至以普通学术，悉寓于树艺、烹饪、缝纫及金、木土工之中。此其说创于美

① J. A. Boydsto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Dewey, The Middle Works, Vol. 13,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Carbondale, 1983, p. 230.

② J. Blewett, John Dewey: His Thought and Influence,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60, p. 215.

洲，而近亦盛于欧陆。……实利主义之教育，因亦当务之急者也。”同时，他又指出：“今日美洲之杜威派，则纯持实利主义者也。”^①

1913年7月，近代中国教育家黄炎培在《教育杂志》第5卷第7号上发表了《学校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批判当时的学校教育脱离实际和脱离生活，主张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打破平面的教育，而为立体的教育。……改文字的教育，而为实物的教育。”“此种教育，在欧美不仅著为学说，且见诸实行。……今观吾国教育界之现象，虽谓此主义为唯一之对病良药，可也。”^② 黄炎培不仅从理论上论证了教育与生活、学校与社会的联系及其必要性和可能性，而且结合当时中国的普通教育和实业教育情况具体提出了采用实用主义的方案。《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一文发表后，曾在当时中国教育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热烈的讨论。黄炎培提出的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的主张，较大地推动了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应该指出，蔡元培、黄炎培他们提出中国的学校教育要采用实用主义教育的想法，实际上是在学习和吸取西方教育理论的基础上，试图从理论上清除传统的封建教育影响以及解决教育近代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的一种努力。这不仅反映了当时中国经济的发展对教育改革的迫切要求，而且也与当时的“科学”和“民主”思潮以及“教育救国”思想的流行有着密切的联系。

此后，中国教育界对实用主义教育的兴趣渐增，很多教育学者和人士对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竞相研究。在1916—1918年的《教育杂志》上，连续刊载了介绍杜威教育学说的文章，例如，署名“天民”的《杜威氏之教育哲学》《杜威氏明日之学校》等。在《新教育》杂志1919年1卷第2期上，也发表了一些文章，例如，沈恩

① 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5页。

② 中华职业教育社编：《黄炎培教育文选》，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8页。

孚的《杜威教育主义》、郑宗海的《杜威氏之教育主义》等，较系统地论述了杜威的教育理论。因此，到杜威访华前夕，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已成为一种有影响的教育思想。

为了迎接杜威来中国访问和讲演，胡适、陶行知他们做了不少准备工作。1919年3月31日，陶行知在《时报》的《教育周刊》第6号上发表《介绍杜威先生的教育学说》一文，指出：“杜威先生，是当今的大哲学家，也是当今的大教育家。……杜威先生素来所主张的，是要拿平民主义做教育目的，实验主义做教学方法。这次来……，必定与我们教育的基本改革上有密切关系。”^①同时，又简要介绍了杜威的生平和著作。1919年4月，赶在杜威来华访问和讲演之前，创刊不久的《新教育》杂志特地出了“杜威专号”（1卷3期），刊登了杜威的照片和“杜威先生传略”以及胡适的《杜威哲学的根本观念》和《杜威的教育哲学》、蒋梦麟的《杜威之伦理学》、刘经庶的《杜威之伦理学》等。胡适还应邀请杜威来华的团体的要求，就实用主义运动作了4次讲演，除讲到皮尔斯和詹姆士外，特别着重讲述杜威。甚至在杜威在中国第一次正式讲演前一天，即5月2日晚上，胡适还对1000多名听讲者作了一次关于实用主义的讲演。这些文章和讲演，在一定程度上激起了人们对杜威来华访问和讲演的热情以及对实用主义哲学和教育思想的兴趣。

二、杜威的中国之行

1919年初，当杜威正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讲演时，他收到了来自中国的一封邀请信。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江苏教育会、浙江教育会和尚志学会等5个教育团体邀请他来中国讲学。杜威在征得哥伦比亚大学校方当局同意续假后高兴地接受了这个邀请。这是杜威以前的一些中国学生胡适、蒋梦麟等人努力的结果。

^①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陶行知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102页。

胡适在他的“自传”中曾这样回忆道：“当蒋梦麟和我这一群杜威的学生听说他在日本讲学时，我们商请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江苏教育会和……尚志学会筹集基金邀请杜威来华讲学，并负担全部费用。”^①

1919年4月28日，杜威偕夫人奇普曼（A. Chipman）一行乘“熊野丸”号轮离开日本前往中国。据1919年5月1日上海《民国日报》的报道：杜威夫妇是4月30日抵达上海的。北京大学代表胡适、江苏教育会代表蒋梦麟、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代表陶行知以及欢迎的人群在码头上欢迎杜威夫妇的到来。杜威的女儿露西（Lucy Dewey）是1919年7月加入杜威的中国之行的。

对于杜威来说，在中国的早期日子里，最高兴的一天是5月12日与孙中山先生的见面。由于对哲学颇有兴趣的孙中山特别感兴趣于思想与行动的关系，因此，在与杜威见面时就讨论了这个问题。后来，杜威曾这样回忆道：“那天傍晚，与前总统孙中山先生在一起感到很高兴。”^②

杜威中国之行的足迹遍及奉天（今辽宁）、直隶（今河北）、山西、山东、江苏、浙江、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11个省和北京、上海、天津3个城市，作了200多次讲演。杜威的女儿露西后来回忆说：由于听讲者十分踊跃，杜威在“那些省城里的讲演都被安排在最大的会场里，那是必要的。”^③“听他讲演的，不仅有学生和教师，而且还有其它知识阶层的代表。这些地方的报纸也充分报道了杜威的讲演活动。在许多情况下，杜威所作的讲演都由一位速记员记录下来，然后发表在一些广泛发行的小册子上。”^④

1919年10月20日，是正在中国访问和讲演的杜威的60岁生日。

① 《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0页。

② G. Dykhuizen, *The Life and Mind of John Dewey*,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Carbondale, 1973, p. 195—196.

③ *The Life and Mind of John Dewey*, p. 199.

④ 简·杜威著，单中惠编译：《杜威传》，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51页。

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特地为杜威举行了60岁生日晚餐会。在晚餐会上，蔡元培致词说：“我所最先感想的，就是博士与孔子同一天生日……。博士的哲学，用19世纪的科学作根据，用孔德的实证哲学、达尔文的进化论、詹美士的实用主义递演而成的，我们敢认为是西洋新文明的代表。”他还说：“我觉得孔子的理想与杜威的学说有很相同的点。这就是东西文明要媒合的证据了。但媒合的方法，必先要领得西洋科学的精神，然后用他来整理中国的旧学说，才能发生一种新义。”^①后来，1920年10月17日，北京大学举行典礼授予杜威名誉博士学位。在这次典礼上，蔡元培称杜威为“西方的孔子”，在场的人对此给以热烈的掌声。杜威本人后来说，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②。

当杜威来华访问的资助者和从前的学生在上海第一次见到他时，都希望他能在讲演中谈论教育改革。实际上，杜威后来在中国各地所作的讲演的内容非常广泛。但是，概括起来看，杜威在中国讲演的主要内容主要是现代科学、民主、教育及其相互之间的密切联系。他讲演的基本观点大多出自《学校与社会》(The School and Society)、《儿童与课程》(The Child and the Curriculum)、《民主主义与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以及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讲演稿(即后来出版的《哲学的改造》)等著作。从杜威在中国的讲演题目来看，有关教育方面的讲演仍为数最多。因此，在中国的两年多时间里，杜威与新教育共进社及其成员保持了密切的联系。

全国各地报纸都对杜威的访问和讲演活动作了充分的报道。《新教育》杂志1920年第3期出了“杜威专号”；《平民教育》杂志也出了“欢迎杜威博士专号”。杜威在中国的讲演被译成中文，随即或以整篇或以概要的形式发表在中国的哲学和教育杂志上。胡适

① 《蔡元培教育论著选》，第239—240页。引文中的“詹美士”，今译“詹姆士”。

② The Dewey's Experiment in China, p. 10.

曾把《每周评论》第26号、27号编辑成《杜威讲演录》专辑。有些讲演后来还被汇编成书出版，例如，1919年10月由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新学社编辑出版的《杜威在华演讲集》、1920年8月由北京晨报社发行的《杜威五大讲演》、1921年2月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的《杜威三大演讲》^①、1921年9月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的《杜威罗素演讲录合刊》（张静庐编）、1921年10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杜威教育哲学》。其中，《杜威五大讲演》一书在出版后的2年中，共计重印14次。由于杜威没有留下讲演的英文的原稿，因此，直到由美国学者克洛普顿（R. Clopton）和香港学者欧春城合编的英文译本《John Dewey: Lectures in China, 1919—1920》1973年出版后，美国教育学者及西方教育界才了解杜威在华讲演的具体内容。

1921年7月11日，杜威一行离开北京赴山东访问。在济南讲演（7月18—23日）和游泰山、谒孔庙以及青岛游览（7月25日—8月1日）之后，杜威于1921年8月2日偕夫人和女儿一起离开青岛取道日本回国。从1919年4月30日抵达中国至1921年8月2日离开中国，杜威的中国之行共计2年4月又3天。

由于北京大学等教育团体的安排以及杜威从前的那些学生的帮助，杜威在中国的访问和讲演活动确实是成功的。在杜威离开中国前一个月，在纽约发行的《中国学生月刊》（Chinese Students Monthly）上曾刊登了这样一篇文章，其中写道：“杜威先生在中国的行程是非常成功的。从他抵达中国到现在，所到之处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一些银行家和编辑经常去他的住处拜访；一些教师和学生则集聚在他的教室里。一些社团竞相接待他，听他的讲演；一些报纸竞相翻译并刊登他的最新言论。他的发言和讲演被竞相阅

^① 《杜威三大演讲》一书包括“教育哲学”、“试验伦理学”、“哲学史”三个部分。其中，“教育哲学”这一部分又单独成书出版，即1935年4月上海大新书局出版的《教育哲学》。

读，他的传记被精心撰写。人们认真地评论他的哲学，并毫不费力地记住他的名字。”^① 美国学者基南（B. Keenan）也这样指出：“约翰·杜威在中国受到了极为热烈的欢迎。杜威个人对改革和进步的赞同以及他作为一个现代教育哲学的权威，使他引起了很多听讲者的兴趣。”^②

与此同时，中国之行也给杜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女儿简·杜威 1939 年在《杜威传》（Biography of John Dewey）一书中曾这样写道：“不管杜威对中国的影响如何，杜威在中国的访问对他自己也具有深刻的和持久的影响。杜威不仅对同他密切交往的那些学者，而且对中国人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由衷的敬佩。中国仍是杜威所深切关心的国家，仅次于他自己的国家。……杜威从美国到中国，环境的变化如此之大，以至对他的学术上的热情起了复兴的作用。”^③ 1967 年，大约在杜威访问中国 46 年后，曾参加过杜威的中国之行的露西·杜威也回忆说：“中国人民是极为友好的人民，他们给我们以无微不至的关怀并十分大方。在中国的这两年是我一生中最丰富多彩和令人愉快的，对我的父母来说也有同样的感觉。”^④ 对于中国之行，杜威自己在 1920 年 1 月 13 日给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主任科斯（J. J. Coss）的信中就曾这样写道：“这是我一生中所做过的最有趣的和在智力上最有用的事情。”^⑤

三、师承于杜威的近代中国教育家

在中国访问和讲演时，杜威与一些中国学者和知识分子交往密切，美国塞顿·霍尔大学教授培里（T. Berry）在《杜威对中国的影响》（Dewey's Influence in China）一文中曾指出：“在访问中国

① The Dewey's Experiment in China, p. 34.

② The Dewey's Experiment in China, p. 10.

③ 《杜威传》，第 52 页。

④ The Life and Mind of John Dewey, p. 200.

⑤ The Life and Mind of John Dewey, p. 205.

期间，杜威自己同中国知识分子之间在学术思想上的交往程度确实是令人惊讶的。”^① 这里培里所提及的那些“中国知识分子”，主要有杜威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时的学生胡适、陶行知、陈鹤琴等。

从1904年起，杜威在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和师范学院任教，一直到1930年退休。对于杜威来说，这一时期是他一生中的重要时期，美国学者基南在《杜威在中国的实验》（The Dewey's Experiment in China）一书的开头就明确指出：“作为世界上实用主义哲学和教育的最重要的倡导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杜威在他的多产的生涯中达到了顶峰。”^② 由于杜威与美国教育界和心理学的其他一些著名学者，例如，孟禄（P. Monroe）、克伯屈（W. H. Kilpatrick）、坎德尔（I. L. Kandel）等，都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任教，因此，使得哥伦比亚大学在哲学和教育理论方面不仅成为美国具有很大影响的一个著名大学，而且成为在世界上享有盛名的一所著名大学，从而吸引了国内外众多青年前去学习。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胡适、陶行知、陈鹤琴以及蒋梦麟、郭秉文等作为赴美国留学的青年学生先后进入了哥伦比亚大学。在那里，他们无疑受到了杜威的思想方法和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这些后来致力于中国教育改革的学者，“在美国进步主义思想的中心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并在其生平的某点上自认是他的大师约翰·杜威的追随者。”^③ 特别是胡适，他最终选择实用主义为自己的思想信仰，实际上是由于杜威的影响。

尽管胡适、陶行知、陈鹤琴都师承于杜威，并且是近代中国新教育运动的推动者，但是，他们在思想方法上或在教育观点上从杜威那里受到的影响程度并不一样。尤其应该指出，陶行知和陈鹤琴

① John Dewey: *His Thought and Influence*, p. 224.

② *The Dewey's Experiment in China*, p. 9.

③ 许美德、巴斯蒂等著：《中外比较教育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4页。